

司法機構徹底改革 彰顯法治公義



馮煒光

法官輕判及放生「暴徒」，日益引起爭議。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烈顯倫早前以中英文在報章撰文勸喻，香港司法界「是時候緊急改革」。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在審判最前線的法官們（尤其裁判官）繼續予人「放生」暴徒的觀感。司法機構確需要徹底改革，確保公正公平審案，彰顯法治公義。

例如9月16日，不同法庭的三名裁判官竟一連「放生」六名暴徒，有直接判無罪的；有承認縱火罪的犯人，只獲輕判18個月社會服務令，連700港元賠償金，也因為求情而獲批准可不用賠償給政府；有以自簽500港元、守行為12個月而獲撤銷控罪。

輕判「黃絲」黑暴令人質疑

這三位裁判官中的一位，近日更對有商人入稟控告郭榮鏗在主持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時「行為不檢」，予以拒絕，並為郭的行為作出辯解，無視「過往選舉內委會主席在10分鐘內完成而郭主持

會議卻要7個月也選不出主席」的事實。更重要的是，煽暴派政客當時便明言，他們拖延選舉內委會主席，目的就是要阻礙《國歌法》通過。可惜，裁判官對此置若罔聞。

近日有12名港人棄保潛逃，在非法進入內地時被中國海警拘捕。這12人中有7人竟由同一位主任裁判官批准保釋。此前，有法官多次對暴徒判無罪或輕判社會服務令，甚至公開稱暴徒為「社會棟樑」、行為「不算太暴力」等，令人質疑法官判決不公。法官輕判「黃絲」黑暴、保釋條件太寬鬆，造成不少黑暴棄保潛逃，導致法治公義不能彰顯，情況之惡劣，實在令人擔憂。

英國在2010年8月爆發暴亂，香港司法界奉為主桌的英國法庭，24小時運作，快審重判，讓公義得以彰顯，也令英國避免陷入暴亂泥淖。如今香港司法界的做法剛好相反。誠如烈官所言：「給了那些走上街頭暴力抗議的人一種個人主權的感覺」，烈官反問「以香港長遠利益為重的主權者還會保持沉默嗎？」

公正審案保港長治久安

有法官更把自己抬高到全國人大之上。烈官舉例，2019年11月，兩名高等法院法官判決《禁蒙面法》案時，自行理解香港自回歸後的「憲制秩序」而判《禁蒙面法》無效。烈官指出：「難怪這個判

決立即引起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的激烈批評。」烈官要求香港司法機構徹底改革，要「擺事實講道理，而不是從信奉意識形態中求真」，若繼續容許「律師顛倒基本法」，只會「鑿毀（香港）法律和秩序的華廈」。法官不能予人公正審案的觀感，這情況必須盡快改善，否則香港難言長治久安。早前有不少立法會議員、社會人士提出設立監察司法機構的機制，如設「監察司法委員會」及「量刑委員會」，指引法官量刑的標準，有關建議值得司法界認真考慮和積極配合。倘若香港司法界再不自我糾正，誠如烈官所言，「主權者會繼續保持沉默？」

盡早恢復跨境往來 融入灣區復甦大勢

邱偉銘 博士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 福建省僑商聯合會會長

在中央大力支持下，本港「普及社區檢測計劃」順利完成。在香港抗疫嚴峻時刻，570多名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員馳援香港，國家支援隊與港醫護並肩抗疫，無懼勞累，累計已接受採樣人數約178.3萬，共識別至少42名病人。「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對於找出隱形患者，截斷傳播鏈，盡早結束第三波疫情，並為應對秋冬季可能出現的第四波疫情打好基礎。此外，此次普及檢測還有一個目標，就是為早日恢復順暢的跨境往來創造條件。

香港經濟和市民生活受到疫情重創，許多需要往返內地的企業人員無法出差，許多跨境家庭大半年分隔兩地，抗疫新常態之下，政府應藉完成「普及社區檢測計劃」之勢，改善和做好長期的公共衛生政策，建立常設檢測機構，盡快恢復粵港澳關口暢通。適逢今年國慶中秋同一天，迎接舉國同慶的日子，呼籲政府加把勁，在疫情受控的情況下，推出港版「健康碼」，給市民送個禮，讓團圓。

市民期待中秋前推出「港康碼」

一場疫情，令加速建設中的粵港澳「一小時生活圈」，成了世界最長的距離。粵港澳三地為了防控新冠疫情，一直採取嚴防死守的策

略，對出入境檢疫實行嚴厲管制。市民從香港去深圳，再回香港，往返要被隔離檢疫28天。如此耗費時間，大多數市民不是遇到人命關天的大事，都望而卻步。

封閉狀態持續，使香港經濟蒙受重大損失。消費及旅遊相關行業尤其受到重創，運輸業的業務收益跌幅擴大。據政府統計處最新數字，本港大部分的主要服務行業的業務收益均有不同程度跌幅。2020年第二季度與去年同期比較：住宿服務業-71.0%、零售業-31.4%、運輸業-28.6%。

如何在抗疫新常態之下恢復正常的社會經濟民生活動？內地人手一份的「健康碼」為復工、復產、復學及正常開展各項活動，發揮非常重要作用。這個經驗對香港有重要借鑒意義。深圳自2月推出「健康碼」以來，從病毒溯源切斷疫情傳播，到便捷市民「無紙」快速出行，近期又將其升級成為「就診健康碼」，「健康碼」已逐漸融入日常生活。

大灣區城市經濟復原動力勁

受新冠疫情襲擊，許多城市都在衰退，但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表現出非凡的復原能力。今年首7個月，深圳市外貿進出口總值達1.61萬

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年增長1.6%。7月進出口2,752億元，按年增長13.5%，增速較6月份加快4.6個百分點，增勢進一步鞏固。香港重新出發，有賴融入大灣區的發展。

建設大灣區的關鍵之一是人員最大限度的自由流動。疫情控制十分重要，但解決民眾來往也必須兼顧。現在澳門、廣東及內地其他省市開始互通，香港落後了！要急起直追，特區政府加把勁推出港版「健康碼」，要積極主動與廣東和澳門政府溝通協調，研究如何共同防疫和保障市民來往便利，促進三地經濟社會民生重回正軌。

從這次實施「普及社區檢測計劃」情況來看，普檢遇到了反對派泛政治化的阻擾，反對派不希望看到香港抗疫成功，害怕因此而增加特區政府的公信力、認受性。特區政府在政治攻防戰中勇敢沉着應對很出色，9月1日，從首林鄭月娥見記者時表示：「從今天開始、從我這屆政府開始，我們很重視正本清源、撥亂反正，正確的說話要有膽量說出來，否則不斷把不正確的說話或混淆的說話傳播開去，便失去了原本的意義。」我們希望特區政府更積極作為，盡快推出「健康碼」，重振香港經濟，回復社會正常秩序。



高佩璇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第三波疫情爆發兩個月來，安老院舍成為爆發疫情的高危地方。7月份以來，全港有20來間安老院所爆發疫情，中招者達到100多人。這波疫情感染者中約4成為老人，死亡患者中9成以上是長者。其中，住安老院舍患者死亡率較居家的患者高出大約10%，至今已有20多名居住安老院舍的長者死於新冠肺炎。對此我們感到痛心。

疫情暴露香港安老院舍在公共衛生危機面前的脆弱，也將香港積弊已久的養老問題再度暴露在大眾面前。港府應藉此危機檢討安老服務不足，為長者提供有尊嚴的安老環境，以應付人口老化和公共衛生風險。

香港是個老齡化社會，65歲以上長者人口明年將超過19%，也就是每10個人裏面，接近兩人是長者。雖然香港養老模式依然以家居養老為主，政府提供「社區照顧及支援服務」，但「院舍照顧服務」是香港安老的重要部分，民眾需求很大。目前香港1,000多家安老院所，約7萬個床位，能進入安老院所的老人不足8%。公營安老院舍一床難求的局面已經延續多年。據媒體2018年的統計，長者須花3.2年的時間等候公營安老院舍床位，甚至有數千名長者在等候中去世。這樣的情況迄今沒得到改善。

而與此次院舍爆發疫情關聯密切的是，安老院舍空間狹窄，環境堪憂。政府規定的法定最低人均樓面面積僅為6.5平方米，相當於兩張大床的面積，除去公用面積，床與床之間甚至容不下一張能夠轉動360度的輪椅。一旦發生公共衛生安全事件，如此逼仄的環境很容易成為傳染病的溫床。而如此環境，老人的尊嚴和老人的心理情緒統統被忽視了。

安老院舍環境改善一直是個大話題。社會曾有聲音呼籲增加安老院舍法定最低人均樓面面積，但面對需輪候3年多的數千長者，在先解決床位困境還是改善院舍基本環境問題的所謂「二選一」中，政府唯一一聲嘆息。但是，安老問題不應該是「二選一」的選題，麵包要，牛奶也需要。香港安老是政府需要承擔的重要責任，也是一個文明社會的標記。

事實上，香港不是沒有土地，而是缺乏合理利用土地的能量。社會上可以爭辯在高爾夫球場建屋，為何不可以不在鄰近市區的郊野綠化園地撥一點土地興建安老院舍？再不濟，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一部分，香港完全可以爭取中央支持，在大灣區建現代化康養中心，令這些為香港作貢獻、打拚幾十年的老人，能夠在較好的環境裏安享晚年。安老政策如何適應香港老齡化社會需要，政府應該下大決心了。

一個有為政府不僅要為秋冬可能出現的新冠疫情捲土重來為安老做好充分準備，也需要為未來日益嚴重的人口老化問題做好規劃，訂定目標。「未耆老以及人之老」——老有所養，老有所依是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體現，期待在10月政府工作報告中，能看到特區政府安老工作亮點。

疫後香港需檢討安老政策



丁江浩 民建聯中委 教聯會理事

事事關心

歷時14日的「普及社區檢測計劃」，累計有178.3萬人進行檢測，共找出42名確診者。普檢除了希望找到社區隱形患者、切斷病毒傳播鏈，還希望通過檢測了解社區感染情況，有助政府調整防疫措施，更為下一波疫情爆發需大型檢測做好演練與預備工作。

普檢數量龐大，並且需要在很短時間得出結果，必須有國家核酸檢測支援隊幫助下，才能完成如此大型病毒篩查。普檢的成功全靠內地支援隊每一位隊員辛苦付出，香港市民幾分鐘的檢測，背後藏着檢測隊員多少的汗水和辛勞付出。連日來有很多市民表示希望透過我們向國家檢測支援隊表達由衷的感謝。

國家核酸檢測支援隊除了需面對巨大的工作壓力及超時工作外，還要承受來自一些別有用心人士的抹黑，包括有人無端質疑支援隊「相關做法不符合本港法例和專業守則」、「內地醫護人員無法以英文溝通」，有人甚至說「內地醫療團隊會把港人基因樣本送往內地」、「內地機構的診斷中心可能播疫」等，以上妖言惑眾的做法與反修例風波時反對派的造謠行徑同出一轍。

這次普檢不是強制性，與內地做法有所不同，政府一直強調檢測原則是「願檢盡檢」，因此普檢十分考驗市民的自覺和責任感。因為新冠病毒一般有潛伏期，市民絕對不可能像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所言，可以自認為自己不會受到感染而不參加檢測。因為即使是醫生，也不可能在未經科學檢測的情況下斷言自己未受感染。一旦有隱形患者在社區持續出現，就難以有效遏止本港疫情蔓延。因此，普檢應該是人人有責，亦是每一位市民是否真正愛護香港的體現。可惜，這次的普檢香港一部分人不單止不參與，還發動別人杯葛，甚至惡意攻擊參與檢測的市民，令人側目。

抹黑普檢盡顯攬炒派本性



深圳集中政府資源拓轉型升級路

唐傑 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經管學院教授 深圳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長

2010年代上半段，深圳經濟轉型，實現新一代創新產業對傳統的模仿型產業的替代。其中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的崛起做得很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從經濟轉型的理念看，比較早地提出了有質量的穩定增長的轉型政策主張，經過多輪轉型實踐，深圳上上下下對走創新轉型道路認識已經比較統一，行動比較自覺。二是對轉型過程中如何發揮市場、企業與政府作用有比較清楚的認識，在以改革創新推動經濟轉型與產業升級方面有了比較豐富的實踐和以往的成功經驗。比如，1987年的《深圳市人民政府關於鼓勵科技人員興辦民間科技企業的暫行規定》，1994年深圳市科技局頒布的《深圳市技術入股暫行規定》和《深圳市技術分紅暫行規定》，使剛剛起步的深圳有了很強的人才吸引力。

再比如，深圳依國際慣例最早建立無形資產評估事務所並推出管理辦法，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和解決創新形成的無形資產入股障礙方法有

很好效果，民營高科技企業也因此而蓬勃發展，等等。

深圳新一代信息產業政策的主要內容是：政策目標，突破關鍵技術，強化自主創新，優化發展環境，促進產業融合。組織方式，集中政府資源。

比如，設立新興高技術產業發展領導小組和具體辦事機構，統籌各部門資源。從2011年起，連續5年共計25億元人民幣，設立專項資金用於資助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核心技術攻關、創新能力提升、產業鏈關鍵環節培育和引進、重點企業發展、產業化項目建設等方面。

儘管對這一時期深圳的轉型政策進行系統性評價還嫌時間過早，但仍可初步判斷，深圳的轉型政策是有明顯時代特點的混合型政策，適度集中政府行政資源，支持市場整合，引導企業進行創新轉型。

當然，每年5億元的政府財政支出相對於2,000億元規模且在滾動成長的產業，說是杯水車薪並不誇張。政府對轉型政策能夠成功的

信心應當來自於，政府可以洞見到個別企業觀察不到的稟賦優勢信息，並通過產業政策方式支持特定產業的發展。

很顯然，這是深圳25億元財政投入五年滾動能夠取得成效的關鍵。

深圳轉型升級政策能夠取得成功，與政府與創新網絡建設關係也很密切。深圳轉型政策的有效性與創辦公共研發機構和共有知識共享有很大關係，看似嘉年華的IT領袖峰會則發揮了重要的新思想交流碰撞，實施與驗證的作用。

事實上，從研發投入的結構看，我國政府研發投入佔全部研發投入的比重只有20%左右，與美國有10個百分點左右的差距。這說明我國政府在基礎研究方面的研發投入力度大大弱於美國等發達國家，需要進一步加強，以增強我國技術創新的原發動力。

（走向世界城市前沿的深圳系列六之五，未完，明日續）